

经济学之路

左大培 杨春学 编

敬贺朱绍文先生八十八寿辰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0-53
20

经济学之路

左大培
杨春学
编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6611

RAP46/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之路/左大培,杨春学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04-4192-4

I. 经… II. ①左…②杨…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341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汨 泉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此书是由朱绍文教授的学生们撰写的学术论文集，以此纪念老师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58 周年。文集取名为《经济学之路》，有三层含义：一是纪念老师近 60 年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二是论文基本上属于经济思想史的范畴，也是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三是表达对老师引导学生们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感激之情。

朱绍文教授，生于 1915 年。原籍江苏省，在上海读完高中后，于 1934 年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和大学研究院。当时日本的学制，学习的对象是德国，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还要接受“高等学校”三年的基础教育，之后才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当时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教授也大多是德国留学回国者，德国经济学，特别是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几乎成了东大的“官学”。

在著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博士的指导下，完成了以《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因在留学生中宣传抗战而被捕入狱。对于这一段经历，朱绍文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述：“我从 1939 年进入东大经济部开始，就聆听先生（即大河内一男博士）的‘弗·李斯特经济学’的特别讲座，令人倾倒。二年级我就被先生批准进入‘大河内一研讨班’，师从先生直到大学研究院毕业，差不多达六年之久。对我的学问和人生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1944 年 5 月，我因宣传抗日爱国运动，被东京宪兵队总部以日本‘治安维持法’的名义逮捕入狱。我的老师多次到宪兵队抗议，

要求他们放人，如有‘罪’也应提交法院处理，不应长期监禁，更不应严刑拷打。因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是具有‘权威性’的最高学府，东大提出抗议，宪兵队虽然不会理睬，但就不敢随便置我于死地。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第466页）

1945年回国，在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思想史和西洋经济史，并参加了上海的地下民主运动，在上海《经济周报》发表了一系列早期古典经济学的文章。

1950年被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调来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任专门委员，同时任辅仁大学教授。此间，他翻译了卡兹洛夫的《苏联货币论》，合著《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马克思货币单位的基本理论》等论文，受到章乃器、沈志远等经济学家的赞扬。

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应母校和大河内一男老师的邀请，多次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使他得以弥补与国际学术界隔绝了三十多年的缺憾。此时，他虽年已花甲，但仍朝气蓬勃，爱国热忱不减当年，他以惊人的毅力投身学术研究，在《经济研究》、日本东大《经济学集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还翻译了《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等经济学名著。

1979年，通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研究员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后，朱绍文教授被调到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兼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1989年起，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此外，朱绍文教授还曾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顾问、中国日本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常委等。

朱绍文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弗·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与现代中

国》(1943年,日文,东京扬子江出版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与课题》(1992年,日文,与关口尚志、植草益教授合编,东京大学出版社);《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合编,1996年,商务印书馆);《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一批学术论文和译著。

朱绍文教授对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造诣高深,并取得了卓著成就。朱先生认为,中国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寻求走向“文明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冷静地认真学习那些经过人类历史实践检验并公认为经济学经典的著作。特别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情的国家从封建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经济理论,既是反对封建主义、解放生产力的理论武器,也是赶超先进国家的经济学基础。同时,为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老路所招致的人民的苦难,又必须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作为基础。与这种思想相对应,在他的诸多学术成就中,也首推对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独到。

在对斯密的研究中,先生强调,斯密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而且是一位博大精深的社会思想家、启蒙运动的理论战士。即使是《国富论》,也不仅仅是经济学经典,其中也包含着殖民地论、教育论、宗教论,是探索近代社会中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人类生活的社会科学全书。针对国际学术界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他在1987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中指出,《国富论》中的“经济人”“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方法论上的假设”,而是具有“慎重之德”的主体承担者的化身。“慎重之德既是出于人的利己心,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该论文力图沟通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抽象与这种抽象的原型(即英国18世纪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中下等级平民”)之

间的内在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来扩展对“经济人”的理解。根据对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这种新理解,我们可以对白利行为与道德秩序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获得一种启示。

在德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他对李斯特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他认为,李斯特虽然对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但就理论体系的目的和历史任务而言,二者却是相通的。斯密的理论是为了英国新兴的产业资本之繁荣与发展,李斯特的理论是为了德国新兴的产业资本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二者都是在为近代生产力的新兴势力提供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只不过是李斯特的祖国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状态,他还需要为德国产业的发展提供防止英国产业资本入侵的武器。

在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中,朱绍文教授是我国最早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界提出的“价值转形”问题的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翻译了萨缪尔逊的《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所谓转形问题》,并于1981年在全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做了《转形问题的提出及其性质问题》的发言,从而引起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高潮。

在朱绍文教授的整个学术活动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立场:忠实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来努力解决祖国赋予我们的时代课题——促进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富强。且不说他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那些著述,即使是在有关经济思想和外国经济的著述中,也可明显看出他选题立论的良苦用心。例如,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房地产、证券、股票等不正常的过热现象,他写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其教训”(1992)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关注泡沫经济问题的学术论文之一,发表后起到了理论上启蒙的作用,10年后还有人全文转载。

读朱绍文教授的文章,可以体味到其中所蕴藏着的深厚的爱国

主义情怀,他始终没有忘记作为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感。

朱绍文教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论著中,而且特别表现在他为促进中日友好和经济学术交流所做的大量工作中。1989年春,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授予他“东洋哲学学术奖”,赞扬他“为发展世界和平献身于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对人类未来和文化的兴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1992年,在组织的帮助下他创办了“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并独立出版《日本市场经济》季刊。“中心”创办以来开展了多次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刊载了大量介绍日本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了国家领导与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近几年来,他还组织翻译并出版了《现代日本企业制度》、《规制经济学》等一大批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

他在培养研究生时满怀一片爱心,不仅强调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研读,更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人格的教育。他常常教导我们说,研究经济学就是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服务,惟有发自内心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献身于经济科学,才能把自己升华到与所献身的职业固有的尊严地位相一致的人格水平。

作为学生,我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老师和师母各方面的关怀,无以为报,特编辑这本论文集,献给他们,以此表达学生们的感激之情,并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目 录

前言	(1)
“斯拉法革命”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崔丕胜(1)
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科学的真知灼见	左大培(62)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研究	樊 纲(146)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的“政府缺陷”	陈 实(201)
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之争	陶永谊(224)
李斯特经济学的精神:自由与发展	杨春学(270)
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文献概览与 未来研究方向	张晓晶(307)
关于阻碍竞争行为的一个初步考察 ——战后日本家电卡特尔的案例	胡欣欣(350)

“斯拉法革命”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崔丕胜

前 言

斯拉法 (P. Sraffa, 1898—1983) 一生著作不多, 但从 1925 年起他所提出的理论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用商品生产商品》这本被称为“划时代的著作”所引起的激烈争论至今不息。尽管斯拉法本人从事理论研究的宗旨始终一致, 即批判边际主义, 但是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到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甚至涉及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围绕着评价作为批判边际主义基础的斯拉法理论、斯拉法对李嘉图传统的恢复和所谓“斯拉法革命”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等几个理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

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 20 年代斯拉法对马歇尔经济的批判及

^{*} 此文写于 1984 年, 是在朱绍文老师指导下写成的毕业论文。现修改此文参加朱老师纪念文集的写作, 以誌老师献身于经济理论研究及对后辈的教诲。朱老师从青年时代起就矢志不渝地从事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并探索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理论问题。老师一直关注剑桥学派的发展和研究成果。这篇文章所探讨的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新剑桥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斯拉法革命”, 是为基础理论研究, 属于经济学说史的范畴。

其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第二部分讨论《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含义。这两部分的目的在于探讨斯拉法理论的形式过程、理论含义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之后的三个部分分别考察斯拉法及其追随者对边际理论的批判，斯拉法与李嘉图及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关系，也就是从这三个方面考察“斯拉法革命”的理论意义。

一 对剑桥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

（一）20 年代的英国经济和剑桥理论界的一般状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余威未尽，英国在很多方面还保持着黄金时代的强盛势头。但是，战后大英帝国就开始步入了衰落的旅途。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经济，使英国的商船损失了 70%，帝国的海上霸权已不复存在；战争削弱了英国的金融实力，动摇了英镑的稳定地位，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下降了。从 1920 年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起，英国经济在整个 20 年代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设备闲置，出口萎缩，失业剧增，经济效率低下，社会矛盾激化，英国对各自治领的控制也大大削弱。这与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时所看到的那幅英国经济的图画大不一样了。

1890 年，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那时到我们所考察的时期，马歇尔的理论在英国经济学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以他的理论为核心形成了剑桥经济学体系。它歌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制度，宣扬经济和谐思想，赞许经济自由主义。这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英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界，惟马歇尔独尊。据罗宾逊夫人回忆，1921 年她到剑桥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圣经”，此外什么都不知道，杰文斯、古诺甚至李嘉图都是他书中注释里面的人物，马歇尔就是经

济学。^① 尽管时而有人对马歇尔理论提出怀疑，但都无济于事，空气是比较沉闷的。

马歇尔经济学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产物。大英帝国的繁荣昌盛掩盖了英国社会的一切弊病，起码在资产阶级看来帝国的制度是优越的、无与伦比的。马歇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这种时代的烙印。

首先，马歇尔经济是均衡的、和谐的理论。他所描述的是“均衡发展”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经济，只为企业活动提供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环境即可；自由的经济制度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总是能够使经济发展趋向于一种均衡水平。市场是完全的，阶级关系是和谐的。显然马歇尔维护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在英国当时繁荣的局面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走进了艰难拮据的时代，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同时，马歇尔经济学脱离实际的倾向和为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辩护的特征也充分暴露出来了。在日趋恶化的经济局势面前，马歇尔经济学无能为力，连资产阶级的辩护要求也满足不了了。

其次，马歇尔理论的假设前提，除了完全竞争和“其他条件不变”之外，他还假设由各个个别市场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产量、就业和价格水平都是已知的前提，没有必要在分析个别市场的均衡状态之外再来分析它们。但是恰恰在他不分析的地方出了毛病。马歇尔对经济动荡的因素和矛盾视而不见，他看到的是维多利亚盛世，他歌颂的是这个，他的假设前提的出发点也是这个。

第三，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讲，马歇尔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和他所谈论的动态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实际上马歇尔考虑

^① 见琼·罗宾逊 (J. Robinson) 为克雷格尔 (Kregel) 《政治经济学的重建——后凯恩斯经济学导论》所写的序言的第 1 页。麦克米兰出版社 1975 年第 2 版。

的是随着时间而滚动的投资，按照正常比率通常所能赚得的利润，但他却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正常利润。马歇尔用他的静态模式中推导出的结论去分析非静态的经济现象，即由持续积累所伴随的经济增长过程，在理论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漏洞百出。

熊彼特认为，马歇尔对经济事物的考察是包罗万象的。他的体系有很多漏洞和大量的问题，叫人难以理解，既是纯粹的分析，又是对现象的考察；他关于行业供给曲线的考察，实际上是用图表的形式表示了经济史的一些片段；他弄模糊了下降的成本曲线和向下移动的成本曲线之间的可以分辨出来的区别，以及成本下降生产函数不变和成本下降生产函数可变的结果之间的可分辨的区别。^①

第四，马歇尔忽视了许多重要的问题的分析，最突出的是货币。他只把货币当做一般的交换手段，没有深入地考察货币的性质、特征及其在经济制度运行中所起的作用。战争期间英国发生了通货膨胀，战后英镑地位削弱，关于币制改革的争论也日趋激烈，货币金融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这时回头看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不满意的人就多了。

战后英国经济形势的恶化，预示着马歇尔经济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的衰落。一些对他的理论抱有不同看法的人由沉默、不感兴趣，开始逐渐地走向公开的发难。1922 年格拉潘发表了《论经济学的空盒子》。^② 文章对正统经济著作中的收益规律提出了怀疑，认为这个规律和实际问题对不上号，很难说某种商品是在递增还是在递减收益的条件下生产的，特别是在大范围内就更难说了，正统理论中既没有合适的尺度，又缺乏时间概念，所以这

① 见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美国乔治阿伦和安文公司 1955 年版，第 1046—1047 页。

② 见英国《经济学杂志》1922 年 9 月号，第 305—314 页，格拉潘（J. H. Clapham）文。

两个范畴只能是经济学的空盒子。

直到1925年，斯拉法在意大利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成本和产量之间的关系》，翌年，又在此基础上在英国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这两篇文章才真正冲破了沉闷的空气，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二）到垄断竞争中去寻找出路

在斯拉法以前，没有什么人对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和在讨论局部均衡时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两个前提提出过明确的怀疑。直到斯拉法要推翻这两个假设前提，剑桥经济学的局面才为之一变。^①

斯拉法认为，马歇尔把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规律作为竞争价值理论的基础，但是两个规律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可变化的收入在经济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用这样两个异质的规律去说明价格决定，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以收益规律为基础的供给曲线是马歇尔理论体系中的一颗黑子，它扰乱了全部价值理论的和谐。它的脆弱的基础使它承受不起加于它身上的重负。在完全竞争和其他条件不变这两个假设前提下，用交叉的供求曲线说明竞争价值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努力使理论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联系的传统。所以，均衡的竞争价值论是很难有效的。下面是对《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这篇文章主要内容的阐述。

马歇尔体系的矛盾首先是通过收益规律表现出来的。

供给曲线以收益规律为基础，而收益规律是古典经济学用以解释分配和生产的两个不同的规律。收益递减规律主要是同地租问题相连的；收益递增规律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收益递

^① 当然不只是批判马歇尔，斯拉法的批判同整个马歇尔学派都有关系，特别是同庇古有关。见卡尔多（N. Kaldor）《经济理论文集》第5卷第182页注2，1978年达科沃斯版。

增是生产规模扩大的结果。马歇尔把它们并成了一个“非比率收益的规律”，并从它们中推导出供给规律，以匹配需求规律。竞争价值理论就是以后两个相反的力的均衡为基础的。

收益递减规律被从土地的情形推广到使用不变要素的每一个情形；而收益递增规律被做了彻底的改造，劳动分工的作用仅限于一个部门的生产增长时作为独立的辅助工厂有存在的必要的情形。企业规模扩大表现出来的劳动的更大的内部分工完全被放弃了，因为这与竞争条件不符。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外部经济”的重要性。

斯拉法认为，不论怎样改造，这两个规律的不同性质也没有改造掉。用这两个规律解释实际经济生活必然要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如果一个部门的定义范围越宽，那么促使收益递减的因素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就越是可能的；如果这个定义越是受到限制，促使收益递增的因素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样，用以收益规律为基础的供给曲线来研究商品的均衡价值，就要碰上真正严重的困难了。如果一个部门的产量变化不只直接影响它自己的成本，还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那么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就是不合理的。孤立起来的局部均衡不能成立，忽视侧面影响是不可能的。斯拉法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运用收益规律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收益递减规律只适用于某些想象的产品，比如细密的可以微分的产品。对于收益递增规律来说，大规模生产经济不适宜供给曲线的要求，它们的作用范围不是更广阔，就是更受限制。一方面由于产业环境的一般进步产生的外部经济所导致的成本节减理所当然地要被忽视，因为它与一种商品的局部均衡的条件相矛盾。另一方面，发生于内部经济的大量产品的可能性，同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相联系的成本节减，也必须放到一边，必须放弃完全竞争。

放弃竞争，转向垄断，就会发现：成本的差别是同个别企业

规模的差别相连的，而成本的差别是起重要作用的。当然实际情况大都分布在完全竞争和垄断这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样，当生产集中于大量的互相独立的公司的手中时，适合于竞争的理论就可以运用，即使市场是不完全的。

可以把下面的问题看做是斯拉法在文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日常经验表明，相当大量的企业是在个别成本递减的条件下经营的。如果单位生产成本随产量增长而下降，那么是什么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张？正统经济学是无法回答这个难题的。所以，要正视市场的不完全性。

斯拉法指出，企业逐渐增加产量时，如其不降低价格或不支付应增加的市场费用，它们不得不去对付的主要障碍不是生产成本增加的负担，而是销售大量产品的困难。除了需求方面的原因，市场不完全和信用有限使企业增加自己的资本实力也是非常之难的。

承认企业增加销售量需降低产品价格或增加市场费用（但不能计入成本），就是正视竞争自由的主要障碍，甚至这些障碍在市场上是起支配作用的；同时，即使在单个企业产品的供给曲线下降的时候，即不同企业间商品的买者不存在无偏好的现象，稳定的均衡也是可能的。

顾客的偏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每个企业总是有一批常来的顾客的。当生产一种商品的每个企业都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的时候，关于这种商品的一般市场就划分为一系列不同的市场了。每个企业在自己的市场内部都享受着相当于一个普通垄断者的优越性，想扩大自己的市场侵入别人的市场就必须支付相当数量的市场费用。斯拉法就是这样用个别市场的垄断特征破除了完全竞争这个假设前提。

影响垄断者强度的大多数条件是通过影响垄断产品的需求弹性来发挥影响作用的，不管这种原因可能是什么，弹性就是用以估计可以自行决定价格的垄断者的独立程度的决定性因素。需求弹

性越小，在市场上的势力就越大。只要这个弹性增大，人们就会意识到竞争已经开始。弹性增长，竞争会日益强烈，直到相应于完全竞争对单个企业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呈现无穷大时为止。

斯拉法认为，在他所讨论的中间情形中，虽然垄断者有一定的自由去决定其产品的价格，但是适度的需求弹性的意义就是：不论他什么时候提高价格，他就会被他的一部分顾客抛弃，这些人情愿把他们的钱花到其他地方去。垄断者则必须经历由此所引起的实际竞争过程。这里所谓的垄断者是指只控制一种商品生产的很小部分而占据一个特殊的市场位置的企业。这样的企业的供给曲线就应该同它自己特殊市场的需求曲线相配，而不是同一般的需求曲线相配，而且要考虑在一个行业中均衡得以维持的状态时还必须坚持这种方法。因为，这种特殊的曲线绝不能混合成一对集合的供求曲线。上述方法同普通垄断的情形非常相似，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形中，个别生产者决定他的售卖价格就是使他的垄断收益或利润达到最大的可能程度。

在这种和多重垄断相似的情形中，均衡同样是可以确定的。

斯拉法认为，即使在多重垄断的情形中，“不确定的程度也会随着不同的垄断者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相关程度的缩小而消失”。^①而在他所说的情形中，随着对单个企业产品的需求弹性的缩小（可能是有限的），在个别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的速度降得更低时，埃奇沃斯所讲的道理的有效性会相应地变得更大。

斯拉法所说的“均衡是确定的”这个结论不能推广到关于均衡价格问题的论证上。每个企业的价格都可能是不同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它的特殊条件。只能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行业的产品的一般价格有趋向一致的倾向。

^① 这是斯拉法所引用的埃奇沃斯（Edge Worth）的话，见《经济学杂志》1925年12月号第548页。